

责编:陈曦
美编:陈恩武



《民族佩饰之美》
邓启耀 著
[英]凯特·文顿 邓启耀 等摄
译林出版社
2026年1月

美丽佩饰里的人生密码

汪修荣

《民族佩饰之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文书，而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人类学读物，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各种美丽佩饰以及隐藏在佩饰中的神话传说、民族文化、民情风俗以及各种人生密码以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带给读者美的享受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邓启耀先生曾在云南中缅边界当知青，发现那里少数民族衣着与汉族完全不同，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女子都着短衣筒裙，款式、质料、纹饰和色彩各有特色，显示了女性优美的线条和曲线。哈尼族姑娘的服饰艺术、高原民族皮袍毛毡配饰珠宝银饰，刚柔相济；雨林民族蝉衫柔裙配羽鸟兽牙，野趣横生。一些民族支系繁多，每个支系甚至每个村寨的服装配饰都自成一体，有的民族仅服装配饰就多达上百种，无不做工精细，佩饰新奇……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以及美丽佩饰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祖先的尊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民族自信与自豪感，这些都深深打动了作者。也就在那时，还是知青的邓启耀就萌生了从事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的念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邓启耀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人类学研究，此后从事西南少数民族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三十余年，长期在广大的西南边远地区寻找并记录西南少数民族的古代神话、民族文化、民间传说、民情风俗、传统服饰以及部落史等，并长期跟踪调查、记录访谈，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书中大部分照片都是作者亲自拍摄，其中一部分高清摄影照片由英国人类学摄影师凯特·文顿于2018—2019年拍摄。这些照片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的珍贵影像，也是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的田野调查覆盖了从中国南部、西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众多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区，主要包括哈尼族、壮族、瑶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纳西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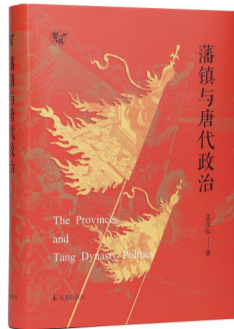
书中集中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饰物(头饰、衣饰、佩饰等)。这些图片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仅涉及大量西南少数民族，还涉及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部分，作者拍摄时详细标明了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内容涉及出生、成年、恋爱、结婚、生育、寿诞、祈福、节日、祭祀、丧葬、死亡等人生各个阶段以及社会交往与活动等，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精美图片揭示了丰富多彩的各类佩饰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节日、社会活动和人生旅程中的各种功能、运用和意义，与民族风俗、文化传承、民族传说、宗教信仰等紧密相联，从中折射出少数民族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存状态。这些照片除了审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传说、禁忌以及生存方式等，提供了大量鲜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佩饰不仅是这部作品的主要聚焦点，也是作者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人类学的切入点。作者按照佩饰的性质与功能，将全书分为诞生祝福、冠笄之礼、婚礼庆典、大寿之归四个部分，把佩饰与人生的四个重要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好象征着人生的四季，从不同时期的佩饰中可以看出人生的不同阶段和生命历程。人生四个阶段的佩饰，各民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作者正是通过佩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反映各民族丰富博大的文化和人类学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民族服饰是出生、成年、婚恋和死亡的标志，是家庭、家族、血亲承诺和社会承诺的象征……民族服饰像一部形象的社会法典，规定了性别、年龄、民族、社会等级与分工等结构关系和社会角色。”“民族服饰同时还涉及宗教、禁忌和命运、灵魂及鬼神信仰等方面的传统文化意识。从民族服饰和款式、色彩、印染和织绣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这些多姿多彩的佩饰对西南少数民族来说，不仅是美的享受，还具有祈愿、祝福、交际、吉祥、辟邪等多种功能，隐藏着西南少数民族丰富复杂的人生密码，“服饰就像一种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也是一种文化密码。”这些美丽多姿的各种佩饰组合在一起，既是一部少数民族佩饰之书，也是一部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书，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既可视作一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佩饰史，也可视为一部西南少数民族民俗史、民情史、文化史，甚至是一部西南少数民族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多元文化的交融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现代文明日益冲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服饰，甚至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部人类学著作作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分鲜活的记录，弥足珍贵，对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对讲好中国故事、振兴乡村、建设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编辑手记



《藩镇与唐代政治》
孟彦弘 著
凤凰出版社
2025年8月

解密唐帝国的裂变与重生 走入藩镇

张永堃

唐代藩镇问题，如同一条贯穿历史的暗流，从安史之乱到唐末，持续一百五十余年，深刻塑造了唐朝的政治结构、军事制度与社会经济。它不仅是唐王朝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一张映照中国中古社会向近世转型的棱镜。在历史的长河中，藩镇既是一个政治命题，又是一场社会与文化的深刻重构。《藩镇与唐代政治》一书，正是对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系统性剖析。本书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彦弘研究员，作者以三十多年的学术积淀，将“藩镇”这一历史现象“抻开”来谈，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清晰而立体的唐代政治图景。

藩镇问题的起源、演变与“河朔化”

作者认为，唐代藩镇问题的本质是控制问题，而其根源在于军队性质的转变。本书开篇便从兵制演变入手，指出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在边防压力下逐渐被节度使兵制取代，军队从“兵民合一”的预备兵转变为职业化的常备兵。随着军人家属随军、驻防地固定化，军队出现了“地著化”倾向，为日后军队地方化埋下了伏笔。

安史之乱成为这一趋势的催化剂。战乱期间，中央为平叛不得不组建大量地方军队，并默许其自筹军费，这导致军队从“中央军”向“地方军”彻底转变。作者提出“军队地方化”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军人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形成了“地方军人集团”。他们不仅干预地方政治，甚至控制节度使的废立，追求建立“军政府”“军人政治”，这便是唐后期藩镇跋扈乃至割据的社会基础。

书中对“河朔故事”的剖析尤为深刻。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并非军事上的彻底胜利，而是朝廷与安史余部达成政治妥协的结果——“河朔故事”意味着朝廷承认河北三镇高度自治。这一妥协虽然结束了公开战争，却开创了地方割据的先例，成为此后其他藩镇效仿的“榜样”。

在朝廷应对层面，书中详细梳理了代宗、德宗、宪宗三朝的藩镇政策演变。代宗朝以稳定为主，对藩镇多行“姑息”；德宗即位后锐意用兵，试图彻底解决河北问题，却因“泾师之变”而失败，最终不得不回归“姑息”，并确立了“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国策；宪宗朝则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军事打击(如平定西川刘闢、镇海李锜)和战略选择(专力淮西，分化淄青)，最终实现了对河北以外藩镇的有效控制，史称“元和中兴”。

作者还提出了“河朔化”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描述河南、山南等地的藩镇(如淄青、淮西、汴宋)效仿河北三镇、追求地方军人自治的倾向。这些藩镇虽一度跋扈，但因其地理位置、内部结构及朝廷的持续遏制，最终未能如河北般形成稳固的割据。书中对宣武(汴宋)、武宁(徐州)、昭义(泽潞)等镇的个案分析，生动展示了朝廷如何利用藩镇内部矛盾、扶持节度使诛杀骄兵、调整行政区划等手段，成功阻断其“河朔化”进程。

突破“藩镇割据”的笼统叙事

本书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它打破了“藩镇割据”的刻板印象，以全新的历史分期视角揭示了唐代后期政治的动态变迁——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并非一成不变的泥潭，而是经历了从崩坏到重建的过程。

代宗承大乱之后，基本稳定住了局面；德宗经建中年间的用兵，控制了山南东道，易定、沧景脱离了成德，基本形成了既能护卫运河又能遏制淮西的藩镇格局；到了宪宗，终于彻底平定淮西、淄青。这个过程也是朝廷逐渐形成明确藩镇政策的过程，可以说是“恢复秩序的六十年”。此后，朝廷虽未能收复河朔三镇，但对中原、东南地

区大部分藩镇的控制日益稳固，这一稳定局面持续了近六十年，直至黄巢之变才彻底打破平衡。

这种分期将唐代后期政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动荡、重建、稳定，使藩镇问题成为理解唐王朝衰落与转型的钥匙，而非孤立的负面符号。

作者在书中首次系统性地总结和论证了朝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核心政策。这一概括并非简单的描述，而是通过对代宗、德宗、宪宗三朝政治实践的细致梳理，揭示出的朝廷对藩镇问题认识的变化发展。朝廷并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清晰的藩镇政策。代宗朝的“姑息”是在大乱之后稳定局面的不得已之举；德宗即位后试图以武力彻底解决河北问题，但建中用兵的失败使朝廷不得不正视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国策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朝廷处理藩镇问题的理性选择。宪宗朝的出兵实践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在平定西川刘闢、镇海李锜后，朝廷并未乘胜追击河北，而是专力对付淮西、淄青，最终实现了对河北以外藩镇的全面控制。

超越藩镇，重识大唐

本书最突出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其鲜明的“过程史”研究路径。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的研究目标不是挖掘新史料，而是“从哪个角度、用什么事例或史事、用什么逻辑、怎样勾勒线索、如何进行解说”。在方法论上，不满足于呈现“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后果”。

以“军队地方化”为例，作者不仅指出安史之乱后军队性质发生了变化，更细致勾勒了这一变化的制度轨迹：从府兵制崩溃到节度使兵制确立，从士兵终身化到家口随军，从地著倾向到地著化，从“食出界粮”的现到军政合一体制的最终建立。每一步变化都不是预先设计的“顶层规划”，而是应对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边地需要长期驻防，于是士兵从一年一换变成数年一换；士兵家口分离导致逃亡，于是允许家属随军；军费供给困难，于是承认“自给”并最终制度化。这些权宜之计的累积，导致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军队变成了由当地人组成、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地方军人集团由此形成。

这种“过程史”的研究路径启示我们，理解历史，不能只看结果，更要追踪过程。对于任何希望理解唐代制度演变、政治变迁的读者而言，本书的论述都极具启发性。

本书的另一重要方法论启示，在于始终坚持“贴着史事走”的研究态度。拒绝空泛议论，拒绝理论先行，一切论述都建立在对史实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种态度的直接体现，是全书对史料处理的审慎与精准。作者在引用《资治通鉴》时，往往同时参照“两唐书”的列传、墓志材料以及《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对系年、史事细节反复核校。作者对史料性质保持高度警觉，如他明确指出碑志、行状等传记资料目的并非“撰史”，行事系年往往不尽详细和可靠，因此在引用时特别注意与《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书相互印证。